

一部具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的传记著作

——评《李达传记》

王永康 阳 光

宋镜明同志著的《李达传记》已于1986年4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集中反映了我国史学界、理论界近几年来对李达研究的最新成果的专著,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所瞩目。已有不少报刊杂志先后发表消息或书评。我们完全赞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曹瑛同志的评价:《李达传记》的出版,“这是继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李达文集》之后,理论学术界的又一件可喜的大事。”“它确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的传记著作。”(《李达传记》·序第1、6页)

这部书通过对李达一生光辉业绩的记述,为我们指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在不同的环境下,应该怎样学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这部书告诉我们要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李达早期的思想历程证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李达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历史,深刻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也只能在斗争中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说明反对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的任务,“忠实于真理”、“始终为共产主义而战”应是共产党人终生信奉的最高准则。我们要坚持真理、斗争不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李达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党的领导地位是人民在革命实践中选择的结果。李达由参加创党——一度脱党——重新入党的曲折前进的过程,进一步说明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用他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说:“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自诩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跟着共产党走,那是没有出路的。”(《李达传记》第114页)这就充分显示,《李达传记》确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好教材。

《李达传记》不仅富有思想教育意义,而且更具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这可从本书下列几个特点论证。

第一,史料翔实,取材精当,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并且有些内容从来未公诸于世。作者历尽艰辛,五载寒暑,跋涉数万里,访问了许德珩、李维汉、沈雁冰等一百多位革命老前辈、老学者、老教授和传主的家属、亲友,跑遍了中央和许多省、市及大学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了近百种报刊和其他文献资料300余万字,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发掘的珍贵史料。作者在大量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悉心筛选,巧妙剪裁,根据自己多年潜心研究李达革命生涯与理论著述的深切体会,博采众长,精心用笔,将高深精湛的理论、丰富的思想内容,用生动、准确的语言,娓娓道来,丝毫不露刀刻斧凿的痕迹,可见作者驾驭文笔之功底。

第二,具有鲜明的个性,充分体现了作为理论家传记的特点。本书抓住李达是卓越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根本特点，着意刻划了李达的个性。全书八章，包括李达年谱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一根本特点而写作的。李达从五四时期起就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斗争了半个世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该书充分表现了这一斗争过程。作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着重介绍了李达在探索革命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的艰苦努力。从建党时期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到大革命失败后不畏白色恐怖，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基性著作以及晚年作《〈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著作，就可以窥见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始终不懈、艰苦探索的光辉历程。作者没有满足于对李达理论生涯的一般介绍，而是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采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概括其理论体系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特色以及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李达传记》写道：“《现代社会学》一书在二十年代实开我国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之先河。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哺育了追求真理的一代青年。这本书流传甚广，影响深远。至一九三三年共印行十四版。在当时的革命者中差不多‘人手一册’，成为必读之书。”（第73页）“《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在三十年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第107页）“毛泽东对此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高兴地读了多遍，并作了详细眉批，还向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们推荐，指出这是本好书，在十年内战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在一次小型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在给李达的信中，毛泽东热情地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称赞这部著作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要李达把此书再寄一些到延安去。延安的同志得到李达这本书，喜出望外，争相传阅。书少，大家都要看，怎么办？有的同志便把书拆开，大家分头拿去看，最后竟没有办法将书收回。”（第105—106页）“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是五十年代中国哲学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成果。它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与指导下写成的。”“毛泽东除了亲笔修改，还亲笔写信，高度赞扬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第154—155页）以上无疑是最有权威的评价，突出了李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光辉形象，也是作者在运用史料分析研究李达理论著述时的许多独到之处。

第三，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李达的教育实践和办学思想。李达不仅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担任教学和教育行政领导工作，长达40年之久。他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和办学思想，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宝贵财富。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太少，并且多半是零碎地介绍。然而作者在《李达传记》中对此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可以说是迄今为止的最好总结。本书从李达早期创办上海平民女校、就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成为著名红色教授，到主持湖南大学校政、担任武汉大学校长都作了专门的详细论述。作者指出，李达从投身党的教育事业开始，就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的办学宗旨，坚持为人民办教育，“不能为教育而教育”，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强调教书育人；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提倡启发式、少而精，提倡自修；倡导科学研究，使重点大学办成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重视人才，爱惜人才，依靠教师，民主办学，等等。该书都有充分的论证。

第四，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评价公允。该书对李达生平与思想及其著述的分析论证，没有夸大其贡献，也没有回避其缺点错误。作者在谈到李达早期的理论贡献时指出：“诚然，

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中，李达所发表的文章也有不准确、不精当、乃至错误的地方。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象其他共产主义者一样，他也未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未曾正确地解决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革命步骤等问题。……但是，这种难以避免的理论上的缺陷，决不能抹杀李达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所立下的重大历史功绩。”（第44页）该书对李达脱党的原因和脱党后继续宣传马列以及重新入党等问题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证。作者明确指出：“李达脱党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归纳起来，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厚，以致思想与实践脱节——这是当年离开组织的总原因。’”“李达脱党是他‘生平所曾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最严重的、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但李达脱党以后，仍与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坚持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第71页）建国前夕，李达重新入党，“这是党中央对他脱党后二十余年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第131页）

第五，突出了李达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李达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一直站在思想理论斗争的最前列。他坚持真理，对那些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最难能可贵的是，从60年代初开始，李达就坚决反对林彪鼓吹的“顶峰论”。作者写道：“他多次对人讲：‘顶峰？难道不再发展了吗？！’‘这种提法太绝对了！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有人当场提醒他：‘这是林彪同志说的，中南局的决定也是这样写的。’李达却毫不在乎地回答：‘我知道，我不同意！’他接着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辩证法。‘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违反辩证法的东西，不管是那个讲的，都不能同意！’”（第172页）读后令人感到正气凛然，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形象跃然纸上。

第六，将李达这个历史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来写，把人物研究与历史研究巧妙地结合起来。这部书扼要地叙述了李达的青少年时代，以两章的篇幅叙述了他在建党前后的活动，其后按历史时期着重叙述了他在理论宣传与教育战线上的活动和贡献，结构严谨，章节编排得当，重点突出。本书章节编排与党史、现代革命史的分期是大体相符的。李达活动的背景取材尤为精当，它不是一般历史的复述，而是从大量具体的历史材料中经过去粗取精进行新的提炼和概括，有的背景只用了两三句话就交待得一清二楚。这样写的背景自然清晰，一目了然，读后可以从中看出李达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是同中国革命的脉搏息息相关的。

第七，以记叙为主，史论结合比较好。本书在着重记叙李达一生的同时，又对李达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作了恰如其份的评论。这种评论不是抽象概括而是夹叙夹议，寓论于史，体现了史论结合的原则。读后令人可信，因为评论是以史实作基础为依据的；读后也可以使人获得要领，因为它不是史料的堆积；读后还可以引人发思，因为从中可以领悟某些道理；读后可以看到一个真理探索者所走过的漫长道路，因为它真实地勾勒出了李达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此外，载入本书的《李达年谱》也是值得称道的。它为广大学术工作者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研究李达的生平、思想和著述，提供了颇有学术价值的重要工具。

综观全书，不难看出，《李达传记》用新的史料、新的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以及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李达研究的论著中，无疑这是一部颇具特色、较为完备的传记著作，因而受到学术界和许多读者的欢迎。

美中不足的是，本书在介绍李达的理论建树时，对其经济思想、史学思想挖掘不够深，缺乏系统介绍，对李达的生活轶事也着墨不多。